

征服迦南叙事的圣经考古与文学批评*

厉盼盼

提 要：以色列人定居迦南的方式是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其中，征服模式影响深远。论文从圣经考古及圣经文本的维度对征服模式进行分析，并反观其合理性与偏颇之处，以期对圣经研究、以色列历史和考古新领域的探索有所裨益。

厉盼盼，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关键词：圣经考古 圣经文本 以色列历史 迦南

《希伯来圣经》承载的信息与以色列历史息息相关，具备一定的以色列历史知识是正确理解《希伯来圣经》的基础。^①在圣经历史上，再没有像重建以色列十二支派在巴勒斯坦和约旦河外定居的历史过程更具有挑战性了。^②对于以色列人定居迦南的方式，学术界争议颇多，在诸多理论中，征服模式（The Conquest Model）影响深远。该模式认为，以色列十二支派集中军事力量，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入侵并占领了迦南，在被摧毁的废墟上建立了以色列独特的宗教和文化。本文通过对考古资料和圣经文本进行综合分析，借此反观征服模式的合理性和偏颇之处，以期对圣经研究、以色列人定居迦南的历史和考古学新领域的探索有所裨益。

一、征服模式与圣经考古

征服模式认为，以色列人分三个阶段征服迦南，首先攻占迦南中部（书 6—8）^③，其后攻占迦南南部（书 9—10），最后攻占迦南北部（书 11）。他们逐一摧毁了迦南的城市，消灭了那里的原住民，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并形成了独特的以色列宗教文化。就圣经阐释传统而言，该模式与《希伯来圣经》，尤其是《约书亚记》所记载的内容大体相符，也与摩西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流浪旷野，最终抵达应许之地迦南的叙事传统相一致。但是，如布莱特（John Bright）强调的那样，应当把考古研究置于历史研究的前沿。就判断圣经传统真实性问题而言，考古研究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客观参照作用。^④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亦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研究早期以色列历史必须依赖考古学

而非圣经文本，因为圣经书写受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制约，其研究遭到种种限制，只有对考古发现进行全面考察，才能在早期以色列历史研究中取得突破性成果。^⑤圣经考古为征服模式提供了大量佐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色列人进驻迦南时期，迦南的许多城镇确曾被摧毁，包括《约书亚记》提到的拉吉（Lachish）、伊基伦（Eglon）、底璧（Debir）、夏琐（Hazor）等，因此有学者断言：“确有公元前 13 世纪迦南诸多城市遭到毁灭的证据，能证明该地绝对发生过一场有计划的战役，犹如《约书亚记》第 10 至 11 章所描述的战争。”^⑥

其次，圣经中记载的有些未被约书亚摧毁的城镇，或未见于被征服名单中的城市，考古发现也证明其不存在被毁灭的迹象。如基遍（Gibeon）因与以色列签订条约而免遭毁灭（书 9:1—27）；他纳（Taanach）也未被毁灭（士 1:27），这些圣经记载均与考古发现相一致。

再次，考古资料显示，青铜时代晚期确实有新移民入住那些被损毁的城市，他们摧毁迦南城鎮，在废墟上建起简陋房舍定居下来，那些新定居的移民可能就是半游牧的以色列人。在早期以色列人生活的核心地带中央山地，其政治经济结构、生存起居方式、房舍建造模式等均与迦南传统文化差异显著，那些出现在中央山地的村庄明显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这一事实为以色列族群入驻迦南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此，亚丁（Yigael Yadin）认为，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巴勒斯坦地区，大量城市被摧毁，表明该时期物质文明的发展突然遭到了停滞和断裂。从被毁的遗迹可以推测，那种情况绝非地震、饥荒或瘟疫等自

然灾害所致。那种新的文明和建筑风格，难以用渗透模式（The Infiltration Model）或起义模式（The Revolt Model）来解释，极可能是军事征服造成的结果。^⑦因此，以色列人定居迦南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尖锐的斗争，以及重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⑧

第四，考古学家在迦南城镇废墟上发现了新居民使用过的陶器，它们表明，青铜时代晚期与铁器时代初期的陶器在烧制方法、图案设计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异，前者品种多样、做工精美，后者样式单调、制作粗糙，显然并非出于同类陶匠和陶窑，而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和族群，以致与征服模式相互印证。

由上可知，考古资料所显示的迦南文明在不同时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为武力征服模式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以色列文化虽然与迦南文化差异很大，却在某些重要的层面延续着迦南文化的特征，而武力征服模式割断了以色列与迦南之间的联系，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考古学角度看，迦南的青铜时代晚期与铁器时代 I 期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确实存在一定延续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在陶器制作方面，虽然就技术工艺水平、陶器种类以及外来陶器的比例而言，处于青铜晚期的迦南陶器远非铁器 I 期中央山地的陶器可比，但就判断陶器是否存在一定传承性和连续性的重要因素（如类型、形体、工艺等）而论，却在一定的变异中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⑨

其次，在语言和文学方面，考古学发掘的一些古代铭文拓片由青铜时代晚期的雏形迦南文字写成，后来成型的希伯来语无非是迦南语言（西部闪语）的一支方言而已。至于最早的希伯来文学，如代表希伯来早期诗歌的“红海之歌”（出 15 章）、“底波拉之歌”（士 5 章）等，其措辞、形象及思想主题都非常接近迦南的“乌加里特”（Ugarit）诗歌，对它们的解读需要借助于迦南诗歌。

再次，在宗教方面，考古学极少在铁器时代 I 期的中央山地发现典型的宗教崇拜，然而，发掘于撒玛利亚山区附近的青铜牛犊，却与迦南宗教偶像并无二致。^⑩在后来的以色列宗教嬗变过程中，依然存在着青铜牛犊崇拜现象，如《出埃及记》第 32 章及《列王纪上》第 12 章所示。考古研究表明，在铁器时代 II 期，中央山地的宗教崇拜，其圣坛和圣所的形制、崇拜器皿、祭献立柱、对女神亚舍拉像的崇拜等，都表明迦南宗教依然对以色列人发生很大影响。圣经传统甚至将以色列崇拜中的迦南元素视为导致北国以色列亡国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迦南宗教在以色列

日常生活和宗教事务中的盛行程度。

第四，在生活习俗方面，考古资料显示，在铁器时代 I 期，位于中央山地的村庄对猪有所禁忌，这无疑有助于理解宗教戒律关于食物的传统及其背后隐含的认知世界，对此，施塔格（L. E. Stager）提出：“食物禁忌能够表明族裔的特色。”^⑪但是，还需要发掘更多山地遗址，方可对此做出确切结论^⑫，虽然“某种群体的物质文化能够反映该群体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所受邻近文化和先前文化的影响；如果是移居群体，还能反映出其原居地的传统，并反映出他们的认知世界”^⑬。即如赫斯（R. S. Hess）所言，“物质文化能够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特色，但未必能反映出族群特色，其物质文化并不能清楚表明那些人是以色列人而非迦南人。如果认为每个族群都有特色鲜明的文化，且可以凭借考古学研究而得知，这种假设无疑是站不住脚的”^⑭。

可见，以色列人以武力征服迦南的观点不足为信，更何况，毕姆森（J. Bimson）指出，在公元前 13 世纪，圣经所载多处被征服的城市似乎还无人居住，圣经中有关迦南城市被摧毁的描述，并不像所设想的那样与以色列的侵略活动相吻合。^⑮迦南各城邦先后被毁，在时间上差别较大，不可能由一次即便是旷日持久的征战所导致。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发掘，出土了数以百计于公元前 13 至公元前 11 世纪建造的小城遗址，那些地方主要集中在中央高地，被视为以色列人的聚居地。据圣经记载，那些地区曾是早期以色列人的据点，并最终成为其属地。

此外，麦伦普塔赫石碑（The Merneptah Stele）是考察以色列历史的重要资料，尽管信息不多，但极其珍贵。该石碑上记载：“以色列惨遭蹂躏，几乎灭种。”^⑯这是唯一提到“以色列”（Isrir 或者 Israel）的古埃及文字记录，也是迄今为止能表明以色列存在的年代最古的证据。但问题是，石碑上的“以色列”是指一种民族身份^⑰还是指位于迦南的一个领地^⑱？如果是前者，它指的是一个游牧部落团体，还是一个定居群体？对此，芬克尔斯坦认为，早期以色列极有可能指一个半游牧社群，而非固定村社。^⑲总的说来，石碑引发的问题比它能解决的问题还要多。^⑳而且，从以色列出土的大量焚毁层无法证明迦南被征服的大概时间。没有足够的资料表明，在巴勒斯坦中部许多城市发现的毁灭层是由以色列人的武力征服造成的。甚至不排除那些被摧毁的城市和以色列人无关的可能性，因为被毁之城有可能是迦南原住民互相攻击的结果，也有可能是迦南之外其他民族入侵所导致。

由此可见,“征服模式看似合理,甚至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但前提是必须对所选择的考古证据进行适当的鉴别。纵观圣经资料和经外文献,就会发现征服模式有着极大的局限和不足”^④。更何况,“那些半游牧以色列人的生产力如此落后,并没有足够力量迅速征服生产力相对发达的迦南人。况且有些曾被以色列征服的城市,考古资料显示它们并不像《希伯来圣经》所记载的那样,处处都有被战争破坏的痕迹”^⑤。再加上征服迦南者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来表明其身份,比如石碑、拓片等。也没有资料显示那些征服者是非利士人、埃及人、迦南的其他敌人、迦南本土的反抗者、以色列人,或者半游牧的侵入者。虽然有一些被摧毁的城市遗迹,但是它们缺乏历史记载,很难得到鉴定,况且考古资料相当有限,甚至部分资料之间存在互相矛盾的情况。

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些支持征服模式的考古资料,在采用考古资料论证征服模式时,有两个相关问题需要解决:其一,考古发掘是否发现了所有以色列人征服并摧毁的城市?其二,那些被摧毁的城市在破坏程度、分布范围和数量上有何区别,时间先后如何?在哥特瓦尔德(Norman K. Gottwald)看来,未受过良好训练的考古学家想解决以上问题并非易事。由此他提议,为了更好地诠释圣经,考古学家应当具备历史学家的素养,考古学家用于历史重建的考古资料应能经受历史学家的检验。^⑥

二、征服模式与圣经文本

圣经不仅是宗教典籍,而且承载了古代以色列社会的大量信息,然而“圣经的历史传统强调叙述事件的宗教意义,实际上掩盖了现代历史学家重建历史时所需要运用的信息”^⑦。加之圣经中关于以色列人定居迦南的叙事存在诸多矛盾,极富争议,因此,难以为征服模式提供可靠的经文佐证。众所周知,《士师记》和《约书亚记》是解读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的重要经文,但两卷书彼此之间存在着大量矛盾和冲突,以致拉姆斯(G. W. Ramsey)称之为“希伯来人征服迦南地的矛盾记载”^⑧,德弗(William. G. Dever)将《士师记》视为与《约书亚记》相悖的另一种记载,坚称两卷书不可调和,因为二者“明显存在冲突,矛盾太大”。^⑨

《约书亚记》讲道:“约书亚击杀了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书 10:40);“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都赐给以

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书 21:43)。以上两句经文往往被视为武力征服模式的确凿证据,并且表明以色列征服迦南的过程是迅速、血腥而彻底的。然而矛盾的是,《约书亚记》又指出:“犹太人无法把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赶走”(书 15:63),他们“还有广大的地方没有征服”(书 13:1-7)。

《士师记》也详细记载了“以色列人没有赶出去的民”(士 1:27-36),如:“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士 1:29);“亚设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士 1:32)。此类经文充分表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后并未彻底征服那块土地,而是和迦南人混居在一起,即如哥特瓦尔德所言:“迦南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并不存在尖锐的矛盾和鸿沟,至少不像征服模式所描写的那样,两个截然不同的族群进行公开的激烈斗争。”^⑩对此,《出埃及记》中早有伏笔,称上帝在与以色列人立约时就发出告诫: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出 34:11-16)

这是一段自相矛盾的文字,由此引发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以色列人并未大规模消灭迦南人,那么,迦南人必然成为以色列人的重大威胁,圣经呈现的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恰恰反映出这一威胁的存在。这说明以色列人并未彻底消灭迦南人,而是以和平渗透方式进入迦南,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发生了激烈冲突,二者才逐渐成为敌对者;第二,既然以色列传统和迦南传统存在着明显分歧,迦南文化和宗教被大多数以色列人所反对和排斥,就说明以色列人并未对迦南人采取过彻底杀戮的武力征服方式。^⑪再者,该文字首先预设以色列人必定彻底消灭迦南人,却又告诫他们不能与迦南人混居,更不能通婚。如果迦南人已被彻底铲除,以色列人又为何须遵守禁止与迦南人通婚的诫命呢?事实上,该经文经常被用来证明以色列人并未彻底消灭迦南人,以色列

征服迦南并非闪电式的快速征伐，不过是进驻并定居于迦南而已。^②所以，麦克纳特（Paula M. McNutt）认为，青铜时代晚期迦南中心城市的衰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公元前 12 世纪末叶才完成。^③本托（A. Ben-Tor）和鲁维亚托（M. T. Rubiato）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一致认为，《约书亚记》表达的是“急速征服迦南”，而《士师记》描述的是一个与之全然不同的情景，以色列定居迦南的过程非常缓慢，大体上采用了和平渗透的方式，散居的以色列各支派逐渐出现在中央山地，并与迦南人混居生活（士 4:1-2, 23-24）。^④

种种迹象表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过程应该比圣经文本记载的更为复杂，如杨格（K. L. Younger）所言：“征服模式难以尽信，因为它只简单地从字面意思解读《约书亚记》。”^⑤换言之，征服模式对《约书亚记》的理解过分简单化了，忽视了征服事件本身的曲折性和经文编撰过程的复杂性。例如，征服模式假设迦南居民与物业被全部铲除，《约书亚记》却未如此记载，其中论及迦南城市被攻占、君王被处死时，仅言及耶利哥（书 6:24）、艾城（书 8:28）和夏琐（书 11:11, 13）三个城邦。在圣经文本中，迦南城邦遭到攻击的记载固然不少，考古学却未能提供相关的重要发现。况且研究显示，即便存在信实的圣经文字记录，证明明确曾发生过武力征服迦南的事件，也未必能从考古发掘中印证该事。^⑥例如，考古研究发现，约书亚攻下的耶利哥城和艾城均未存在于约书亚时代，而是后来新兴的城市。即使耶利哥城早在公元前 13 世纪就存在过，也只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小村落，顶多只是一个堡垒而已；而艾城当时并未被占领，直到好几个世纪之后才被征服。^⑦可见除了“传统”和“认知世界”以外，早期以色列留下的考古痕迹甚少。

蒙登豪尔（Gorge E. Mendenhall）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以色列支派联合起来，对迦南大举武力侵略与征服的事件；也没有确切资料能够证明当时迦南人口发生了巨大变化；更不能证明该地区曾经发生过大屠杀或大规模驱逐人口之事。那里所发生的不过是社会的政治变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不堪忍受迦南封建城邦的残酷统治，愤而反抗并推翻了君主制政权，而这些正是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⑧如果像蒙登豪尔所理解的那样，承认以色列人由迦南本土人组成，便忽视了圣经记载的以色列人与迦南人两极分化的事实；亦否定了以色列人出埃及、流浪旷野，最终进入应许之地迦南的过程，进而否定了《出埃及记》所载故事的真实性。《出埃及记》在《希伯来圣经》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反映以色列民族

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倘若否定那部书，便切断了以色列先祖传统的历史性。再者，如勒坡（P. W. Lapp）所言，公元前 13 世纪摧毁迦南城邦者不可能是奋起反抗的本土居民，因为他们摆脱封建领主的残酷统治实属不易，需要基于实用目的而保留那些城池。^⑨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起义者本欲对城池施以较小的破坏，但为了更有力地抗击统治者，而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

基于种种疑点和问题，德弗认为：“整个出埃及、征服迦南的故事系列主要是神话，目的在于为宗教信仰服务，必须将其搁置一旁，虽然不排除其间带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⑩斯潘塞（J. R. Spencer）则断言：“圣经文本的记载并不一致，圣经叙事的内部也存在矛盾，很难从中得到征服迦南的真实情况。”^⑪怀特兰姆（Keith Whitelam）甚至认为：“古代以色列史本是虚构的，是作者头脑中想象的产物而非基于历史真实。铁器时代生活于巴勒斯坦中央高地的群体不能被证明是以色列人。考古资料表明，在中央高地定居点出现的居民乃是由巴勒斯坦本土居民重新组合而成的，并非一个独特的新族群入侵的结果。”^⑫

概言之，征服模式在传统的以色列起源模式中尽管占有重要地位，却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一些考古资料和经文证据也动摇了武力征服模式的稳固性。正如哥特瓦尔德所言：“无论是从考古学角度还是从文学—历史学角度来看，将以色列进迦南视为武力征服的结果均过于武断，因为相关资料过于零碎、模糊，甚至存在矛盾。”^⑬

结 语

学术界之所以对以色列定居迦南的方式这一问题争议不断，一方面是由于学者的理论素养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气质、性情和哲学立场有所不同，最大的原因在于资料证据本身的性质。无论是文化传统、古代遗迹抑或圣经文本，作为历史的沉淀物，均非形成于一时一地 and 唯一类型。那些资料距我们如此遥远，并非都能经得起现代历史学家的重新审视和检验。时至今日，依然有大量相关资料连同其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推理和辨析。^⑭对于征服模式，一如卡莱伊（Z. Kallai）所言，要考虑个案分析要素、现存的考古资料、历史编纂的一般历史处境，以及圣经历史资料的字面表述风格和修辞，然后追索各方面的联系，还要分析圣经文本的书写习惯。^⑮惟其如此，方有助于重新审视考古与以色列

列历史记忆、圣经文本与以色列族群构建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 甘棠)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研究”(13BZJ02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希伯来圣经》社会学批评研究”(2017CZX020)、信阳师范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6014)阶段性成果。

- ①④ John Bright, *Early Israel in Recent History Writing: A Study in Method*, London: SCM Press, 1956, pp 11, 29.
- ②④⑤ Gorge E. Mendenhall, "The Hebrew Conquest of Palestine,"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 25, no 3 (1962), pp 66, 66, 73.
- ③ 本文圣经引文均出自加拿大圣公会 2008 年版新标点和合本圣经。
- ⑤⑬ Israel Finkelstein, "The Rise of Early Israel: Archaeology and Long-Term History," in *The Origin of Early Israel: Current Debate, Biblical,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eds., Shmuel Ahituv and Eliezar Oren, Negev: Ben-Gury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 Press, 1998, pp 10, 16.
- ⑥ George Ernest Wright, *Biblical Archaeolog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2, p 84.
- ⑦ Yigael Yadin, "Is the Biblical Account of the Israelite Conquest of Canaan Historically Reliable?,"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8, 2 (1982), pp 16-23.
- ⑧②③④ [美] 约翰·布莱特著, 周南翼、张悦等译: 《旧约历史》,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 年, 第 151、503、120 页。
- ⑨ 对于铁器 I 期的中央山地与青铜晚期迦南陶器的制作方法、工艺等彼此之间的联系, 巴勒斯坦考古学家争论相当激烈。具体参 William G. Dever, *Who Where the Early Israelites and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pp 118-125.
- ⑩ Amihai Mazar, *Archaeology of the Land of the Bible: 10000-586 B.C.E.*,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pp 348-353.
- ⑪ L. E. Stager, *Ashkelon Discovered*, Washington, D. C.: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1991, pp 9-19.
- ⑫⑳ K. L. Younger Jr., "Early Israel in Recent Biblical Scholarship," in *The Face of Old Testament Studies: 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eds. D. W. Baker and B. T. Arnold, Grand Rapids: Baker, 1999, pp 196, 179.
- ⑭ R. S. Hess, "Early Israel in Canaan: A Survey of Recent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s," *Palestine Exploration Quarterly* 125 (1993), pp 129-130.
- ⑮ J. Bimson, *Redating the Exodus and Conquest*, Sheffield: JSOT Press, 1978, p 1.
- ⑯ James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78.
- ⑰ 德弗认为, "以色列" 仅代表一种民族身份。参

William. G. Dever, *What Did the Biblical Writers Know and When Did They Know It?: What Archaeology Can Tell Us about the Reality of Ancient Israel*,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 p 119.

- ⑱ 作者认为, 石碑中的名字 "以色列" 指的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人民, 参 Gösta W. Ahlström, *Who Were the Israelites*,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86, pp 37-40.
- ⑲ 参 Israel Finkelstein, *The Bible Unearthed: Archaeology's New Vision of Ancient Israel and the Origin of Its Sacred Texts*, New York: Free Press, 2001, pp 113-118. 芬克尔斯坦认为, 在巴勒斯坦地区, 农民和游牧民一直保持着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游牧民需要从农民那里获得粮食和其他农产品, 农民则需要从游牧民那里获得肉、奶和皮毛等。但是, 两者的交换关系并不平等, 农民可以依靠自己的产品活下去, 而游牧民却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畜牧产品, 他们需要谷物蔬菜来平衡肉奶饮食。因此, 当两者的交换关系顺利时, 游牧民可以专注自己的生产, 但是, 当谷物供应断裂时, 他们就必须放弃游牧生活而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这就是中央山地的 "定居-游牧" 循环的秘密所在。所以, 早期以色列极有可能属于一个半游牧的社群, 远非一个固定的村社。
- ⑳ Kenton L. Sparks, *Ethnicity and Identity in Ancient Israel: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Ethnic Sentiments and Their Expression in the Hebrew Bible*,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1998, pp 107-108.
-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 Norman K. Gottwald, *The Tribes of Yahweh: A Sociology of the Religion of Liberated Israel 1250-1050 B.C.E.*,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79, pp 196, 195, 199, 688, 204, 203, 209.
- ㉜ G. W. Ramsey,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Israel: Reconstructing Israel's Early History*, Atlanta: John Knox Press, 1982, p 101.
- ㉝㉞ 同注⑰, pp 122, 121.
- ㉟ Paula M. McNutt, *Reconstructing the Society of Ancient Israel*,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9, p 47.
- ㊱ Amnon Ben-Tor and Maria Teresa Rubiato, "Excavating Hazor, Part II: Did the Israelites Destroy the Canaanite City?,"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25, 3 (1999), p 24.
- ㊲ B. S. Isserlin, *The Israelites*,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98, p 57.
- ㊳ P. W. Lapp, "The Conquest of Palestine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y," *Concordia Theological Monthly* 38 (1967), pp 298-299.
- ㊴ J. R. Spencer, "Whither 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 *Proceedings, Eastern Great Lakes and Midwest Biblical Societies* 9 (1989), p 14.
- ㊵ Keith W. Whitlam, *The Invention of Ancient Israel: The Silencing of Palestinian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230.
- ㊶ Z. K. Kallai, "Biblical Historiography and Literary History: A Programmatic Survey," *Vetus Testamentum*, vol 49 (1999), p 338.